



席勒文集



戏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席勒文集: 全6册/ (德) 席勒著; 张玉书等译; 张玉书选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1161-9

I. ①席… II. ①席…②张… III. ①席勒, J. C. F. (1759 ~ 1805) —文集
IV. ①I51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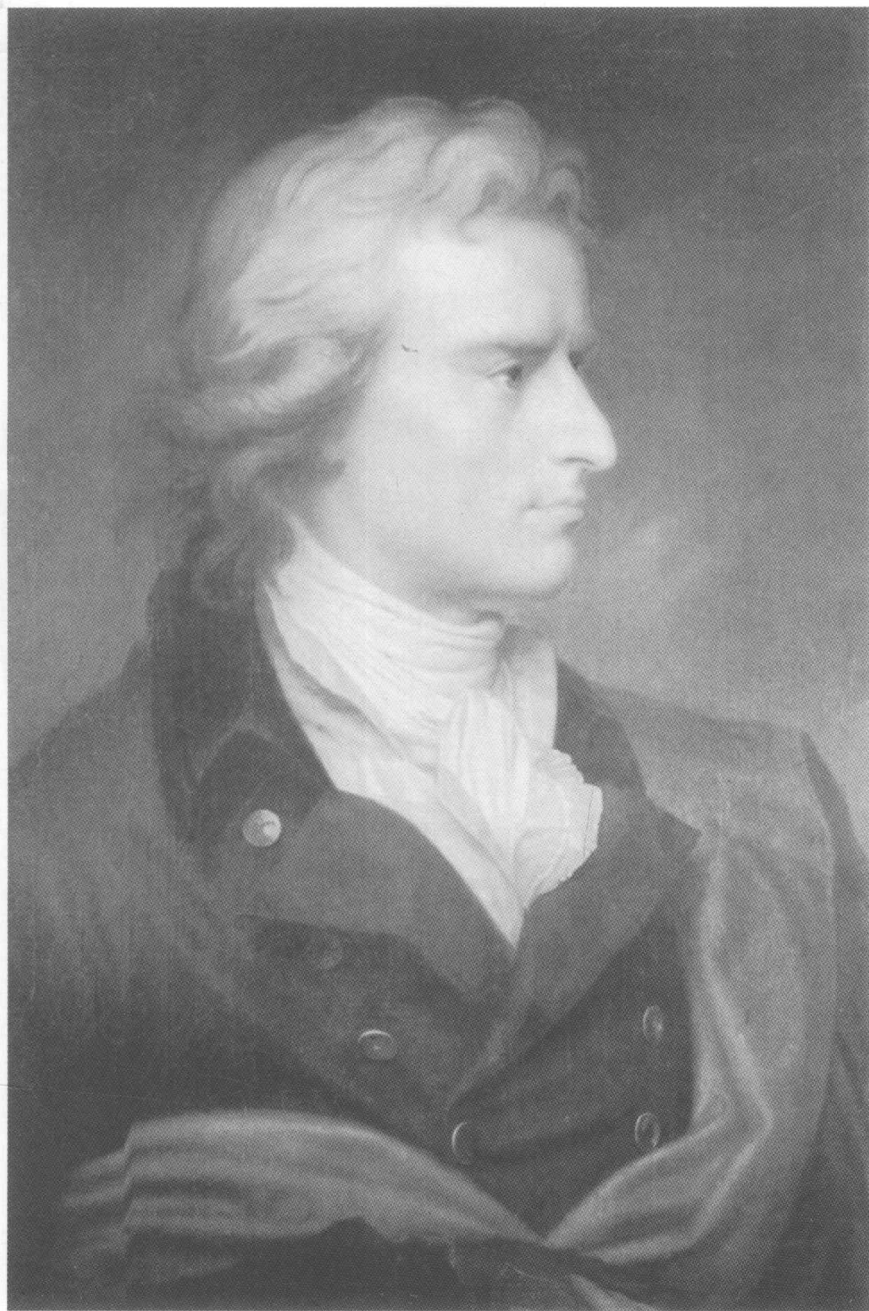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315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全保民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史 帅



席勒



席勒之妻夏绿蒂·封·伦格菲尔特



夏洛特·封·卡尔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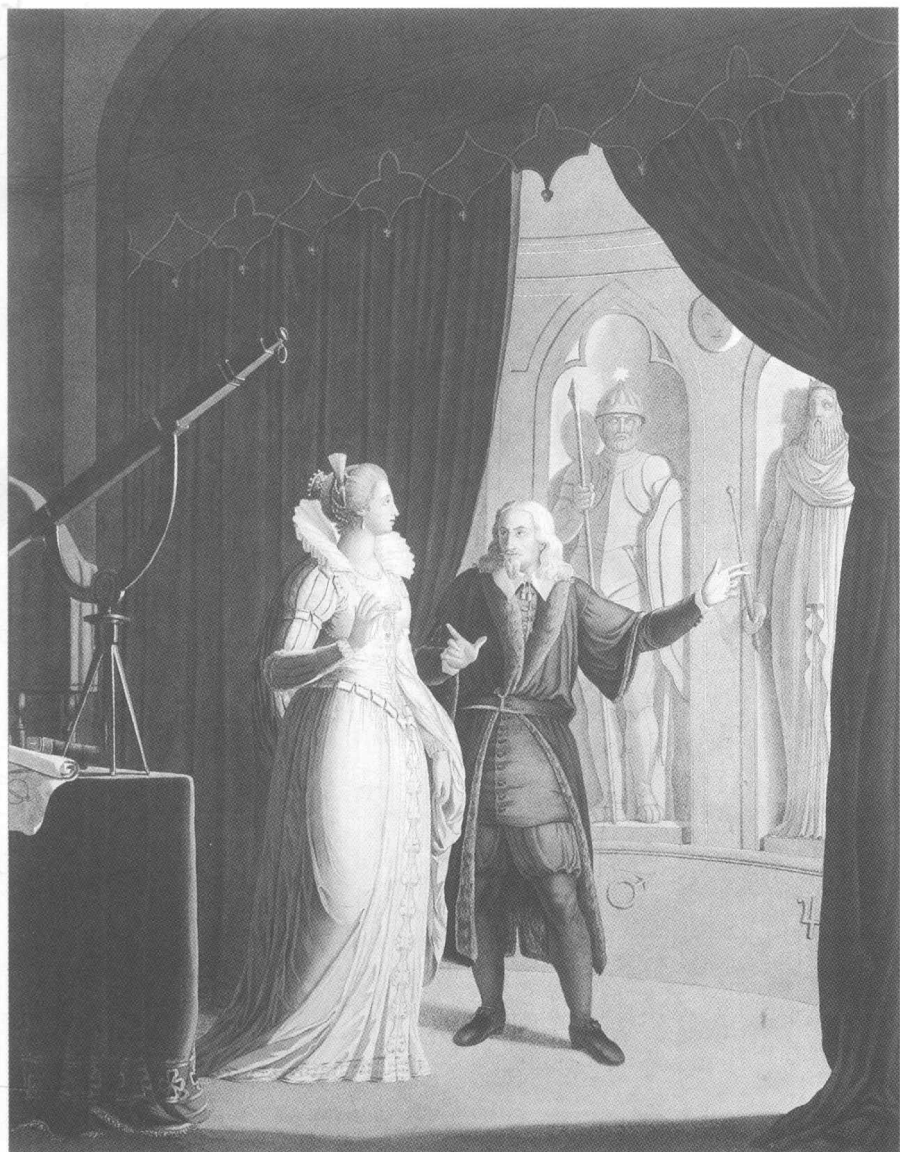
《唐·卡洛斯》



华伦斯坦



《华伦斯坦》



《华伦斯坦》

《华伦斯坦》手稿

前言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动荡不宁,暴风雨即将来临,人心骚动不安。作为时代灵魂的作家,席勒个人的生活也同样富有变化,寄居朋友家中,终非长久之计,找到固定工作,亦非易事。一七八二年起,他应出版社之约,开始撰写小说,虽然成功,并非诗人的心愿。由于创作《唐·卡洛斯》,席勒进一步研究了尼德兰独立史。席勒一向热爱历史,一七八六年四月十五日他曾致函刻尔纳:“我真想十年之内,什么也不干,只研究历史,我想我一定会前后判若两人。”果然从十月份起,席勒便一连写了几篇历史著作,一七八七年他认真撰写《尼德兰独立史》。

席勒一直把写作这本史学专著当作谋生手段,写作也的确是席勒当时惟一能够挣钱的来源。离开德累斯顿来到魏玛后,席勒手头相当拮据,不得不举债度日,全靠这本著作的稿酬来缓和眼前的危急。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席勒寄出一半稿子给出版家,七月十九日全部寄出,十月底出书,在莱比锡秋季博览会上展出。此书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兴趣。歌德也读了此书,魏玛公国突然对席勒有了兴趣,想要把他留住。一七八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歌德在内阁会议上建议授予席勒耶拿大学史学副教授的学衔。席勒对此心情矛盾,他担心教学工作会限制他的文学创作自由,另外他对自己是否能满足学术上的要求也心中无数。一七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席勒拜访歌德,向他致谢,歌德态度友好,但并不亲切,给他的忠告是“边教边学”。《尼德兰独立史》使席勒得以被任命为副教

授。一七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席勒分两次做了他的就职演讲《何为世界史,为何学习世界史》。七周之后法国大革命便在七月十四日爆发。

席勒在《尼德兰独立史》中谈到他最初接触这段历史素材时激动振奋的心情:“这种效果我希望能保持下来,并加以发展和加强,这种使人精神升华的感觉,我希望能继续传播下去,使别人也能得到。这就是使我写这本历史著作最初的动力。而我的整个使命就是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尼德兰独立史》的前言中有下面这段话:

“如果要求我们赞赏追求荣誉的渴望和不幸的统治欲念所创造的熠熠生辉的行动,那么被压迫的人类为了争取自己最高贵的权利而斗争,为了从事善良的事业,各种不同寻常的力量联合起来,濒于绝望境地的人们采用各种辅助手段,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战胜专制暴政的可怕诡计,这样的行动岂不是更应受到我们的赞美。我们想到,终于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暴君的倨傲跋扈,君主们老奸巨猾的计划将在人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毁灭,誓死抵抗也可以把暴君伸出的手臂折断,英勇地坚持斗争,终于也可以使助纣为虐的力量之源枯竭,这种想法是宏伟的,令人安慰的。”

下面还有一句话,后来被删除了:

“(尼德兰人民)行动的力量,在我们当中并没有消失;如果时势重演,类似的契因召唤我们去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成为尼德兰人民冒险行动顶峰的那种幸运的成功,我们也不会得不到的。”

如果我们想到在席勒写下这句话时,正好是欧洲封建制度风雨飘摇,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不得不把席勒的《尼德兰独立史》看成是呼唤这场革命风暴的海燕。席勒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他写的是实用历史。他把历史看成一个武库,从中汲取他所需要的思想,把这思想作为武器交给他同时代的人和他的后世,让他们用这武器为自由去进行斗争,这思想实际上贯穿在他所有

著作当中,无论是他写的历史著作、美学论文、诗歌还是他后来写的历史剧,全都贯穿了一种给人以精神武器去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样一个崇高目的,至于他青年时代写的剧本那就更不必进一步分析了。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席勒创作了《唐·卡洛斯》。

席勒习惯于在作品问世之后,假托别人的名义,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这种自我批评的方式使人看到他作风的严谨。他不像一般文人,敝帚自珍,他能够相当实事求是地指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对《强盗》如此,对《唐·卡洛斯》也是如此。一七八七年《唐·卡洛斯》完成,一七八八年席勒在十二封《论唐·卡洛斯》的信札中谈到,该剧的弱点是写作时间太长,以致重点转移。起初以卡洛斯为中心,作者的爱倾注在他身上,自然突出爱情,写宫闱秘史。开头吸引席勒的东西,后来影响便日益淡薄,最后几乎没有影响。在他心里涌现的新的思想,挤掉了旧有的思想;卡洛斯自己不再受到他的宠爱,也许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在这些年里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卡洛斯,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波萨侯爵取代了卡洛斯的位子。写作之初,正是他和卡尔布夫人热恋之时。因此在王后和艾伯莉公主身上可以看出夫人的特点,一方面高贵稳重,典雅端庄,仪态万方,把爱深埋心底,竭力支持恋人的宏伟崇高的事业;另一方面轻佻浮躁,报复心重,妒嫉心切,气量狭窄,爱得深,恨得切,一旦失恋,宁可牺牲一切,不顾一切。卡尔布夫人初见席勒时完全是个贞静高雅的贵妇人,立即迷住了席勒。他还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贵妇人呢。可是时间一长,随着两人的熟悉和感情的加深,夫人依仗娇媚的丰姿和财产地位,想要彻底控制诗人。席勒感到了压力,再说她那捉摸不定的脾气也叫他难以忍受。这杯爱情的烈酒使他陶醉之余,也使他头痛,因此,在刻尔纳等四个朋友身边享受到的友谊就像清泉一样甘美清冽,使他心旷神怡。席勒这段个人境遇的变化与《唐·卡洛斯》创作重心的转变不无关联。

一七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席勒在好友施特赖歇尔的陪同下,

化名里希特博士,夤夜逃出斯图加特,前往曼海姆,投奔剧院总监达尔贝格男爵。公爵的追捕,男爵的冷漠,使他无法在曼海姆停留。正好他军校同学的母亲沃尔错根夫人,邀他前往她家的庄园鲍尔巴赫,他便欣然接受了邀请。同年十二月,席勒一到鲍尔巴赫,便开了一张很长的书单,托他日后的姐夫赖因瓦尔德替他借书。他阅读了大量关于耶稣会修士和宗教改革、宗教裁判所、巴士底狱的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两个题材强烈地吸引了诗人,一个是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故事,另一个是西班牙王储唐·卡洛斯的故事。席勒在十二月份,即到达鲍尔巴赫不久,就写信告诉赖因瓦尔德:不出“十二天或者十四天”,就能完成《路易丝·米勒琳》。每当一个作品即将完成之际,席勒总是急不可耐地寻找新的题材,往往把即将竣工的作品搁置一边。写作《路易丝·米勒琳》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他思考了几个星期,终于下定决心,写作《唐·卡洛斯》。决心一下,激情立即迸发。他写信给赖因瓦尔德:

“我现在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去写一部《唐·卡洛斯》……我觉得,这个故事比我原来想的,更有统一性,更有趣味。它将使我有机会描绘感情强烈的画面;安排动人心弦或者感人肺腑的场景;塑造一个血气方刚、秉性高尚、多情敏感的青年,他同时又是几顶王冠的继承人;塑造一位王后,迫于她自己的感情,尽管命运给她许多恩典,最后还是遭到不幸;塑造一个妒火中烧的父亲和丈夫,一个残忍伪善的宗教法庭的法官和一个野蛮成性的阿尔巴公爵等等。我想,这一切我大概是不会失败的。”

然而他的经验还很不足,对宫廷还不够了解,他还需等待相当时日,才能写出这部旷世名剧。

席勒善于处理学习和创作的关系。他钻研了尼德兰独立史,于是写出《唐·卡洛斯》,日后研究了三十年战争史,又创作了《华伦斯坦》。可见学习与写作关系的密切。他请求赖因瓦尔德帮他借历史书籍,着重研究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如果对这段历

史没有充分了解,他不敢贸然动笔。熟悉历史仅仅是席勒为创作《唐·卡洛斯》所做的一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准备工作则是他对文艺创作的独特理解。他认为诗人必须成为他笔下人物的情人和挚友,才能设身处地对他们内心深处的隐秘感情有所了解。在他给赖因瓦尔德的信里,他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一位朋友的处境,那么我们也会对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满腔热情……我们必须成为我们主人公的朋友,这是真的,无可争议,……他们向我们倾诉最隐秘的感情,在我们怀里倾吐他们的痛苦和欢乐。……诗人必须少做他主人公的画家——而要多做他的情人,他的挚友。关怀备至的情人,能比目光最为犀利的旁观者更多地吸收千百种只有细微差别的感情……”

尽管席勒知道,莱辛对人生的观察颇为犀利、尖锐,可是他感到莱辛是“他笔下主人公的监督者”,他自己可不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他自己的唐·卡洛斯的:

“我必须向你承认,我在某种程度上对待他(唐·卡洛斯)就像对待我的女友一样,我把他抱在我的胸前——我和他一样在这一带——在鲍尔巴赫周围——兜风……如果我可以比喻来说明的话,那么唐·卡洛斯的灵魂得自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脉搏则得自我自己——另外,我还想在这部戏里为我规定一个义务,那就是在表现宗教裁判所的时候,为被出卖的人类报仇,把它可耻的劣迹暴露无遗。悲剧的匕首到现在为止,只不过擦了一下这类人的表皮,我则要直刺他们的灵魂,即使我的卡洛斯因而不能在剧院演出,我也在所不惜,我要——看在上帝的分上,上帝保佑,您别笑话我。”

在鲍尔巴赫,席勒接触到一位名叫圣累阿尔的法国作家所写的一篇有关唐·卡洛斯的历史小说。返回曼海姆后,他便写出了该剧的第一幕。这时席勒构思的《唐·卡洛斯》还仅仅是一出爱情悲

剧,展现的是国王的家庭画卷。波萨侯爵仅仅是王子的一名侍从,虽然也为受压迫的尼德兰请命,也以整个人类的代表身份出现。到达德累斯顿后,席勒又完成了该剧的第二和第三幕,但并没有第三幕最后一场菲利普国王和波萨侯爵两人交谈的那场戏。这个剧本经过压缩,在葛兴的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唐·卡洛斯——西班牙储君》,以后又改写为散文版,在许多剧院上演。此后席勒又对该剧进行删节改写,在原来的版本里,在唐·卡洛斯为自己的命运悲叹、怨诉中,可以听出席勒哀叹自己命运乖戾的声音。王子和波萨侯爵的友谊也使人想起席勒和刻尔纳的友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剧本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爱情悲剧变成政治悲剧,波萨侯爵的形象和诗人本人交织成了诗人的化身。诗人重视的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这一时代的精神在剧中得到充分体现,主人公似乎成了波萨侯爵。打开此剧的第三幕,成为全剧高潮的一场戏并不是王子和王后热恋的场景,而是国王和侯爵在进行密谈。作者在写第四、第五幕时,心情已完全不同,可是又不能把前三幕完全推翻,只好让后面两幕尽量适应前面三幕。第二幕卡洛斯觐见他的父王和第三幕最后一场国王和侯爵会晤,显示了这一巨大的变化。

卡洛斯觐见父王时,他本想以父子之情感动国王,从而求得尼德兰总督之职。可是老谋深算的国王,怎么会纵虎归山?父子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二人已成水火,岂是一席话,一次表白所能奏效?更何况还有多明各神父和阿尔巴公爵这些佞臣挑拨离间,亲疏早已颠倒,外臣成为心腹,儿子倒成了敌人。在尼德兰暴乱发生,大局不稳的情况下,国王怎么会派出他自己憎恶而又怀疑的太子去前线督战充当总督?这一波三折的父子谈心,终于以破裂告终。国王的两次感动,说明这个父亲天性未泯,可他终归仍旧信任阿尔巴胜于信任卡洛斯,怀疑依旧,父子彻底反目。

第三幕最后一场是关键的一场,也是极有争议的一场戏。人